

(上)

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

全球共此凉热^①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主观成分。

在这里 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是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

但是，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把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有力焉。

此文是作者为《东学西渐丛书》所作的总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可惜的是，西方国家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即以中国而论，我们今天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至衣着打扮，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来的？中国素以美食名扬全球；然而，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余的国家更不必说了。于是乎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响彻全球矣。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天之骄子”自命。他们在下意识中大概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指战争而言。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知）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一旦世界有事，我们中国是处在“百战不殆”的位置上的。有识之士，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曾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

简短一句话，我们编纂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这里。表面上讲影响，介绍内容即寓于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过去都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了。我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李约瑟的文章，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很难译为外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字，简直就无法翻译。在长期的历史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

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是为序。

研究海外汉学 促进文化交流^①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②。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上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

本文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 1 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 7~8 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 14~15 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公元 19 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 世纪初到现在。

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受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重大。“国际汉学研究”丛书担负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全面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状况，本丛书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是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内的学术著作。正如“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丛书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丛书，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推进世界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都深知和平的

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丛书，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要重视中学西传

张岱年

近年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有中学西传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中国学者钻研西方哲学，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也有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很感兴趣，写出了论述中国哲学的著作。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景况，是值得重视的。

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于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哲学很有研究，撰写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于二程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北宋时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唐代实行三教并尊的政策，儒门比较淡薄。到北宋而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曾经“出入老释而返于六经”，大力阐扬孔孟的学说，恢复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高于汉唐儒学的水平。

葛瑞汉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在本书自序中说：“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他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他高度评价了宋代理学，这也是正确的。

编者按：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 A. C. Graham 先生的名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已被程伊川的二十九代世孙程德祥先生译为中文，已作为大象出版社“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之一种出版。此文为《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译本序。

程德祥同志研究二程学，历有年矣，近将葛瑞汉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译成中文，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二程语录的英译文句，藉以显示原作者对于二程语录的了解，这是具有深意的，我表示赞同。我希望这本书对于比较哲学，特别是中西哲学的比较能起到推动的作用。

应加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①

李学勤

—

2001年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汉学家的盛会，会议的主旨，是要“推动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互动，加强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联系，并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目，原拟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后来仔细考虑，就改成《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了。

对于“汉学”、“汉学史”、“国际汉学研究”这样几个词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把 Sinology 译为“汉学”早已约定俗成，现在在中国也比较习惯了。但中国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作“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作的考察和研究。

众所周知，国际上的汉学，从16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历史，今天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国际汉学早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科了。但是，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

以后，才在中国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恢复了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中国学术界迫切要求了解国际汉学。这一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这可说是第一阶段。到了 90 年代，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经常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汉学》、《清华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也陆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是，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随后又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会议在国内举行。这可说是第二阶段。及至 20 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

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我认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至少应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属于上面说过的汉学史的领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作品比较多，有关学者的目光大多被引向古代，热衷于探索古代欧洲人关于中国有多少知识，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国作出了哪些记述等等。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比如这几年对《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的热烈讨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更希望知道的，乃是近现代汉学的发展。

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分国别的汉学史专著出版，但仍然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还是只有 1949 年莫东寅根据日本石田干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等编著的《汉学发达史》。重写汉学通史的工作，看来已是刻不容缓。

第二个问题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哪些研究。

汉学的第一种著作，1583 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同一年，利玛窦 (Matteo Ricci) 来到中国，与不曾亲自来华的门多萨不同，他不仅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且学会了汉语。其著作与札记表明，利玛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汉学有了十分丰富的文献积累。

到了近代，汉学越来越专业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许多是我们需要借鉴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作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征引外国同行的成说 应当视为缺憾。了解国际汉学的工作动态 是中国学术界的需要。

第三个问题，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将之放在其所处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报刊上有不少外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相当详尽，是很好的，然而对其背景的分析，却每每有不足之处。

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若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

第四个问题，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

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与之同时，在中国也产生了西学。晚清以后，西学大为兴盛，其间西方的汉学也进入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汉学的不少学说，为中国学者传播接受，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

与上述问题相对的，是第五个问题，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

日前在报纸上看到翻译《纽约时报》今年（指 2001 年——编者注）

8月29日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耶鲁盛吹中国风》。文章中说耶鲁大学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耶鲁大学的一些官员说，因这些交流活动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会对耶鲁产生更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会使耶鲁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这段话说了对。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方人来到中国，建立了汉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汉学的研究也影响了西方学术本身。日本京都大学的岛恭彦教授，在1941年出了一本书，叫《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论述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怎样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可惜像这样的论著，迄今还不多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发展的趋势。

二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作过普查，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哪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了专门的调查报告。前些年，我国台湾的学者也作过类似的调查。

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介绍汉学的新成果。与此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于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

二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的编纂，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1992年秋成立以来组织的一项主要工作。在各位笔者通力合作、江西教育出版社热心协助之下，本书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顺利付印，实在是值得庆幸的。

汉学一词，在英语是 **Sinology** 或 **Chinese Studies** 而前者的意味更古典些，专指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和 **Sinology** 的词根 **Sino-** 来源于“秦”一样，不是指一代一族。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词的使用范围本没有国别的界限。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是汉学，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是汉学。因此，有人把中国人讲的“国学”就译作 **Sinology**。

有的学者主张将汉学改译为“中国学”，但汉学一词习用已久，特别在海外普遍流行，如果说汉学这个词是外来的，“中国学”一词同样不便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汉学》第一期，都沿用着汉学这个词。实际上，按照国内学术界的习惯，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汉学一词是要更方便些。我们这部书的标题，即是按照这样的意思拟定的。

我前些时候写了一篇小文，登在今年第一期的《东方》双月刊上，题目叫做《汉学漫话》。文中除了谈过汉学一词以外，还提到国际汉学研究应当作为一门学科来开拓和发展。汉学本身在世界上早已成为显学了。从 16 世纪中叶汉学真正诞生起，汉学家已经递传了好多世代，他们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19 世纪末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 或作高第）所编《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便是厚厚的大本。其后出现的汉学论著，更不知有多少倍。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得很细，每一门学科都有相应的历史研究，比如哲学有哲学史，数学有数学史，都是独立的学科分支。汉学这个学科也应该有对应的研究，这就是汉学史，或者叫做国际汉学研究。

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等等原因，这方面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特别是前几十年，我们和国外的同行学者很少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论著国内学术界罕能读到。国际汉学的发展状况大家是相当不了解的。直到近十

年，外国汉学家几乎都来访中国，可是相对说来，我们对国际汉学界还是不够熟悉。这种情形，现在必须加以改变了。

汉学还是中国文化向外国传播的桥梁。如我在《漫话》中所说：中国人很少用外文写书，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只有通过汉学家的翻译和介绍。没有机会前来中国的外国人，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般是由汉学家们描绘塑造的。这也表明，汉学在世界上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这部书，仅仅是我们工作起步的标志。我们本来的想法是，在汉学的浩漫书海中，精选出一系列代表著作，综括介绍，借以勾画国际汉学的轮廓。可是经过一段编写过程，发现在主客观条件上都还有若干问题。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书，不少方面尚欠理想。所选著作的语种殊不完备，就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好在大家会谅解我们的能力有限，就这样“披头散发”地拿出来了。在这里我们能保证的是，今后一定把这样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三

《国际汉学漫步》这部书，是对外国现代一部分著名汉学家及其学术成果的论述评介。参加执笔的各位学者都熟悉国际汉学，其间不少位曾在外国任教或留学。他们或与有关汉学家有较多交往，或对所论汉学作品有较深研究，因此书中介绍绝非泛泛之谈。

国际汉学兴起于16、17世纪，到现代已成为一门羽毛丰满的学科。

各国主要的高等学府，一般都设有汉学系科或者研究中心，每年出现的汉学论著真是不能缕数。由于有关的作品很多，需要有及时的评论作为读者的导引，很多学报辟有这样的专栏。近年又有专门的汉学书评刊物，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 Roger T.Ames 教授主编的《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创刊于 1994 年春季。这充分表明了汉学的发达。

和其他学科一样，汉学的学科发展也是越分越细，论著的专门性越来越强。早期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多作综合的、概观的研究，后来则逐渐深入到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等方面，而且特别强调专题的探讨。结果是汉学家日益专门化了。他们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也趋向于彼此对口，即研究中国某一领域、某一题目的学者，专与中国同样研究范围的同行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往来。这样，中国学者大多只了解自己学术领域内外国汉学家的成果，对于各国汉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却不容易有概括的认识。

我曾经说过，作为中国人去看外国的汉学，不仅要知道汉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应当研究汉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国际汉学研究也就是汉学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最好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汉学的发展演变放在各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只有这样做，才可能正确评估汉学各种流派的意义和特点。

可惜的是，汉学史的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尽管各国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经过，有若干学者写过分别的综合论述，对某些国家汉学的状况，也有不少很好的介绍和讨论，然而系统的汉学史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这方面先驱作品的，如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出版于 1932 年，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的起源》出版于 1933 年，石田干之助的《欧美的中国研究》出版于 1942 年。我国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则是在 1949 年问世的，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石田干之助等人的著作，较多篇幅用以探讨汉学在西方的起源，以

及其早期嬗变的历程。这方面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不少费解的问题，自然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学术界来说，迫切需要了解的，乃是现代国际汉学的状况和发展趋向。由于语言障碍等等原因，中国学者对国际汉学界的认识还很有限，有些学者曾经出访，所能接触的也不一定够多，所以我们的国际汉学研究，应该把较多精力放在现代汉学家及其成果方面。《国际汉学漫步》这部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设计的。

汉学的范围十分广阔，现代的汉学家更是林林总总，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不过是导引大家在汉学繁盛的园林中作一番漫步而已。所以想到这样一个书名，是受了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多年的杨联陞先生著作的启迪。杨先生有一本著名的论文集，题为 *Excursion in Sinology*^①，以往我曾读过，颇多获益。后来在哈佛得见杨先生，也以有关问题进行过讨论。今仿其意，不知是否有当。

《国际汉学漫步》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的第二种。专刊第一种为《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6月出版。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这部书编写和印行中所给予的关切和帮助。

① 周一良先生为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联陞论文集》所作的序中提到的《汉学散策》。